

论唐五代敦煌寺院的农业发展环境

刘 龙

摘 要: 本文依据敦煌文献资料论述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并着重分析了敦煌寺院地产的结构、寺院地产的规模、寺院地产的来源,从而阐述了敦煌寺院地产的经营方式。

关键词: 敦煌寺院;农业发展;地产结构;地产规模;地产来源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增刊-0005-04

任何地区的农业生产都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农作物的种植经营类型。敦煌位于我国大陆西北深部,远离海洋,四周被大山、沙漠所包围,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日照长。四季的特点是:冬夏长而分明,春秋短而界限模糊。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如此严酷的气候本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从地质构造上说,敦煌处于河西走廊北山和祁连山间的山前凹陷槽地。槽地中第四纪沉积物厚达四百余米,在党河、疏勒河等河流的作用下,发育了面积广阔的洪积、冲积、湖积平原,即为敦煌绿洲。源自南部大山的疏勒河、榆林河、党河及其潜流等众多泉流,皆流向中部低地,而后汇成为大河西流。由于甘泉水源不断,水量没有大起大落,用水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当地人民通过纵横密布的沟渠引水灌溉农田,养育着绿洲生命。[1](p.99)

敦煌地区土壤状况因为受到复杂的地形、地

貌、水文特征以及成土母质的影响,主要由生物气候的特殊作用形成栗钙土、灰钙土、灰棕荒漠土,盐土和高山草甸土五大类型。敦煌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很辽阔,但不适宜利用的戈壁、沙漠、山地、寒漠、碱滩等占绝大部分。适宜农耕的土地占总面积的比例甚小,约为5%左右。人工绿洲面积更小约为4%左右。其生态环境由于受荒漠的强烈影响,潜在不稳定性很强,尤其是下游绿洲多与流沙、盐碱地、戈壁相间分布,生态系统的潜在不稳定性更强。[2](p.6)

一、寺院地产的结构

从唐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军正式管辖敦煌,到1036年西夏全面占领敦煌,这一时期敦煌处在吐蕃和归义军先后管辖时期。也是敦煌历史上最为崇佛、寺院最为兴盛的时期。据敦煌文书

收稿日期:2009-11-15

作者简介:刘龙,女,山东泰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记载,此时的敦煌寺院不仅拥有大量依附人口,而且还占有土地,拥有种植果菜的各种园子。

1. 吐蕃管辖时期

在吐蕃管辖时期,姜伯勤先生从耕作土地的角度,将敦煌寺院地产分为“分种地”与“自营地”两类。[3](p. 68)分种地就是寺户从都司领取种子年粮后个体经营的地段。所谓自营地就是以寺户上役的形式提供徭役劳动所耕作的僧侣地主直接经管的田园,分为都司自营地和各寺自营地两级。都司自营地比各寺自营地规模要小。寺户在都司和各寺自营地上的上役,只是寺户提供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寺户所提供的大部分剩余劳动,主要通过寺户各户分种地的课纳实现。寺院地产的绝大部分,都抑配给各寺寺户分种。寺户在分种地段的同时,被迫向寺院提供力役和产品课纳。寺户分种地是敦煌诸寺摄取寺户剩余劳动,保证僧侣的寄生性粮食消费和高利贷经营的本金的主要来源。寺户分种地与两级经营的寺院自营地一起,构成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地产的独特结构。

2. 归义军时期

归义军时期,厨田广泛出现。包含有“厨田”一词的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没有一件属于吐蕃统治时期,其年代都属于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归义军统治时期。究其原因,姜伯勤先生认为是由于会昌毁佛的影响,心有余悸的僧侣地主,把大片寺院土地称为“厨田”,从而造成厨田的广泛出现。会昌年间的毁佛事件沉重打击了佛教势力,唐武宗在总结毁佛的成果时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4](p. 606)由于这时的敦煌处于吐蕃统治时期,所以敦煌寺院地产并未受到波及。但是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形式上服从了唐朝的统治,接受了唐朝的封号。虽然847年继位的唐宣宗没有实行武宗的灭佛政策,但是这时期的敦煌教团还是把寺院地产改名为“厨田”,企图以“常住”的形式予以保留。这是因为在佛教内律中规定寺院可以拥有供僧众生活用的田地,且这些田地是不可侵犯的。在佛教内律中,供僧众生活用的田地等财产称为“常住”。《十诵律》云,“若物,诸比丘现前应分。何等是?除死比丘衣物,余重物。是五事不分,不可取,若众僧、

若三人、若二人、若一人不应分。何等五?僧伽蓝地、房舍地、僧伽蓝房舍、床、卧具、是名不可分。”[5](p. 413)寺院地产是这五类财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规定“是五事不分,不可取”,也就是这五类财产是不可侵犯的。P. 2187c号《敦煌诸寺奉使衙处分常住文书》对“常住”一词下了这样的定义,“应诸管内寺宇,盖是先帝敕置,或是贤哲修成。内外舍宅庄田,因乃信心施入,用为僧饭资粮。应是户口家人,坛(檀)越降持奉献,永充寺舍居业,世人共膺光扬。不合侵陵,就加添助;资益崇修,不陷不倾,号曰常住。”[6](第四辑 p. 158)文书宣告,由官府施入或一般檀越(施主)施入的地产和人户,构成了常住财产。归义军政府对常住财产的态度是“不合侵陵,就加添助;资益崇修,不陷不倾”,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既然敦煌把地产称为“厨田”,使寺院地产以“常住”的形式而得到保护,那么厨田就应该是归义军时期,寺院地产的总称。

二、寺院地产的规模

唐五代敦煌地区,约有十六七所寺院,这些寺院广占良田,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然而,寺院地产的经营和管理却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并且由于资料的限制,唐五代敦煌寺院占有多少田产,恐怕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好在有一部分敦煌文书记录了寺院的收支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较为有利的证据,为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条件。而不能向谢和耐先生认为的那样:“敦煌写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寺院所占耕田的有益资料。”[7](p. 140)笔者将尽可能的对敦煌寺院的土地规模做大体的估计和推算。

1. 吐蕃统治时期

根据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在吐蕃统治时期寺院地产分为寺院自营地和寺户分种地两类。寺院地产的绝大部分都抑配给各寺寺户分种。姜伯勤认为北图咸字19号背面《诸寺户请贷斛斗牒六件》,是可以窥知寺户分种地的文书。并将内容列简表如下:

姜先生认为寺户请贷的“种子年粮”,在“都司仓”按“计料”一项支出。教授正勤在批复中,对各户分别发给5驮、3.7驮或1.5驮。这种差等,并非根据寺户分种面积的差异,而只是根据牒

日期	丑年 2 月 14 日	丑年 2 月 14 日	丑年 2 月 14 日	丑年 2 月 14 日	丑年 2 月 14 日	丑年 2 月 14 日
寺别	报恩寺	龙兴寺	开元寺	安国寺	灵修寺	金光明寺
寺户数	团头 1 (约 5 户)	团头 4 (约 40 户)	寺户 8 户	寺户 7 户	寺户 4 户 (内团头 1)	寺户 5 户 (内团头 1)
贷出者	都司仓	都司仓	都司	都司仓		
贷出项目	种子年粮		种子年粮 (都司麦)	种子年粮	种子麦	
请借数	25 驮	200 驮	40 驮	30 驮	20 驮	20 驮
实借数	25 驮	200 驮	29.5 驮	24.5 驮	15 驮	
人均数		5 驮	5 驮(5 人) 1.5 驮(3 人)	5 驮(4 人) 1.5 驮(3 人)	3.7 驮	
批语	“按计料支給”	“准状支給”	“五户各五驮” 三户各壹驮半	四人各五驮 已下各壹驮半	共便与 十五驮	
批示人	教授正勤	教授正勤	教授正勤	教授正勤		

文列名先后的不同。从这里可以推知,所谓“种子年粮”应该是既包括种子粮,又包括一种“年粮”在春荒时发放此种年粮不是出于慈悲,而是为了以这种无息的贷粮来保证寺户起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各寺户发给 5 驮时应该包括种子粮和年粮,而发给 1.5 驮和 3 驮时,主要指种子麦,因此 1.5 驮为一户寺户最低限度的种子粮。1 驮相当于唐制 8 斗 7 升,则 1.5 驮相当于 1 石 3 斗。据《齐民要术》记载,小麦每亩需种子 1.5—2.5 升,大麦每亩需种 2.5—4 升,一般需 3 升。姜先生以每亩播种麦 3 升计算,则 1 石 3 斗麦种可播种麦地四十亩,以种子粮 1.5 驮为基准,则该寺户分种土地 40 亩。据此姜伯勤估计敦煌寺户分种的地段为每户 40 亩或 40 亩以上。根据姜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计算六寺共有寺户 69 户,以每户四十亩计算则共有土地 2760 亩。然而当时敦煌有寺院十六七所,所以寺院地产至少也有 5000 多亩。

2. 归义军统治时期

归义军时期,寺院地产的结构与经营都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寺院自营地缩小;寺户——常住百姓提供力役的劳役制退居更次要的地位;寺院土地主要由佃农租佃或僧俗地主包佃。厨田广泛出现,在敦煌寺院的入破历中有许多寺院收入的记载,许多前辈学者都据此对敦煌寺院的土地规模做了大体的估算。

净土寺,1956 年,谢和耐氏根据净土寺账目,通过对沙州亩产量和地租量的估计,估算出净土寺在十世纪的地产约在 3 顷以上。姜伯勤先生根据净土寺各渠厨田收入量对该寺各渠的地段面积作了大致估算,延康渠地大约 20 亩,无穷渠地 20

亩,菜田渠地 19.47—22.97 亩,菜田渠生地约 4 亩,菜地约 4 亩,共计 67.47 亩至 70.97 亩之间,不超过 1 顷。日本学者北原薰氏指出:十世纪前半期,净土寺租佃收入在 70—80 石左右,以亩收 1—2.5 石,地税(地租)0.5—1 石计,可算出厨田面积在 70—160 亩。姜先生指出之所以和谢和耐氏的估算有那么大的差距,是因为“谢和耐氏估计当地亩产为 0.5 石,而又认为地租额是亩产的一半的缘故”,姜先生认为事实上当时敦煌地区的亩产量不至于那么低,所以谢和耐氏的估算是不准确的。但是,姜先生的推算也存在一些问题。文书上记载园南地每年收入 8.4 硕,如果按照地租额 0.975——1.15 硕计算,应该在 7.3—8.62 之间,姜先生却算成了 7.3—8.84 亩之间。而且在计算土地总数时,也没有把园南地加上。

报恩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S.6064 载末年该寺有“一百六十三石六斗田收附”,“廿九石麦租非价附”。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地租额在 0.66 石(麦)至 1.2 石(麦粟各半)的幅度中间,则报恩寺大约有土地两顷左右。

其他各寺地产收益状况,庚子年 940 年某寺诸渠厨田收入麦、黄麻、粟、豆等合计约为 59 硕 5 斗 7 驮;961 年灵修寺诸渠厨田收入麦、麻合计约为 28 硕 1 斗;某年某寺诸渠厨田收入麦约为 23 硕 8 斗;某年某寺诸渠厨田收入粟约为 45 硕;有某寺某年厨田收入豆、麦约为 33 硕 2 斗。以上各寺厨田收益为不完全统计,但从残存收入量来看,平均收益为几十石,即使加倍计算,则各寺所占地亩数约为 1—2 顷左右。

以上的推算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

在推算的时候都是根据某一年文书的记载。却忽略了各寺土地是不断变化的。这里就涉及到敦煌寺院土地的来源问题。

三、寺院地产的来源

唐五代敦煌寺院地产的来源,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统治时期有所不同。吐蕃统治时期,寺院地产多以施入的方式获得;归义军时期,寺院地产多以购买的方式获得。

1. 僧俗信众的施舍

唐五代敦煌寺院僧人占田现象十分普遍,他们通过由官府授田或向官府“请地”、从世俗家庭分割财产以及购买等方式获得私人土地。僧人的地产由寺院登记在册,如吐蕃时期文书 P. 3947《寺田历》载:[6](第二辑 p. 459)

僧光圆,都乡仰渠地十五亩,解渠四亩,并在道义佃。

离俗,城北东支渠地七亩,见在。

金鸾,观(灌)进渠地四亩,见真智佃。

维明,菜田渠地十亩,入常住。智广菜田渠地十亩,道义佃。

戒荣,观(灌)进渠地十五亩。(后缺)

僧人的名目旁都注有小字“行”、“丝”,指吐蕃时期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此文书是寺院登记的僧人土地,僧人维明的土地注明“入常住”即施入寺院所有,其他僧人的土地或者是自己耕种“见在”,或者租佃给他人耕种。僧光圆的土地租于道真佃种,金鸾土地租给尼真智佃种,智广的土地则由道义佃种,这些土地都属僧人私人所有。僧人除将均田作为退田充入寺产,其它的私有财产也会转化为公共财产,内律规定僧人亡后有些财物必须留给三宝。

2. 寺院购买土地

归义军时期,随着寺院财富的增加,大多寺院都添置地产。如净土寺多次买地买房舍,S. 6452“麦二斗,买地造文书契用”,S. 6452《酒破历》载“酒叁斗,买舍造文书用”。[6](第三辑 p. 222) P. 2032 背第 118 行“麦二十硕,粟二十硕,买罗家地价用”。[6](p. 476) P. 2040 背“麦二十硕,罗家地价用”,“粟二斗,于罗平水买地造文书日看用”。[6](第三辑 p. 417) 净土寺在短时间内就几次出麦、粟购买土地。足见其买地活动非常频繁。敦煌其

他寺院的买地活动,如 P. 4906 某寺院“麦四石九斗,粟五石一斗”付给“张留德买地价用”。[6](第三辑 p. 233) P. 4907 某寺某年三月二日付“丑拏都头地价粟三十硕”。[6](第三辑 p. 205)

敦煌地区寺院购买土地的记载,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寺院的特殊现象。因为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土地交易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地产交易中十分重视契据的勘造。土地的价格一般都由粮食等实物货币支付,土地价格高低不同,这与土地的面积、肥瘠、位置、灌溉条件等都有很大的关系。敦煌文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大量购买土地的原因,是与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破坏世俗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唐前期以来寺院经济本身发展、巩固的结果。唐后期,寺院以购买土地的方式大规模兼并土地,是受世俗封建经济发展变化制约而产生的。它表明,寺院经济正与世俗封建经济同步发展,寺院经济的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唐五代敦煌地区寺院林立,约有十六七所僧寺道观,这些寺观都广占良田,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农作物收入是寺院私有经济中固定和长期的经济收益。因而土地成为寺院、僧侣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也是寺院经济最主要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土地的多寡便成为寺院实力强弱的最基本因素。正因为如此,佛教寺院总是千方百计的多占土地,促进了寺院农业生产的发展,维持了寺院的正常运转,使僧尼有时间、精力,学习和传播佛学,不断扩大佛教的影响,满足僧尼最基本的物质需求。

参考文献:

- [1] 李正宇. 敦煌历史地理导论[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 年.
- [2] 苏金花. 唐五代敦煌绿洲农业研究[J]. 博士论文, 2002 年.
- [3] 姜伯勤.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 [4] 刘昉. 旧唐书[Z]. 卷 18. 中华书局, 1975 年.
- [5] 大正藏[M]. 第 23 册.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 年.
- [6] 唐耕耦.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 第四辑.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年.
- [7] 谢和耐. 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责任编辑:月车)